

《中华好诗词》雨中遇知音

欧维维



87岁的黄西成一早就由女儿陪同从王府井坐公交车赶到图书签售现场。主办方考虑到黄大爷的高龄，给了“特殊照顾”，让他成为第一位拿到签名的书的人。拿着签过名的新书，黄大爷非常高兴，觉得这一趟“折腾”很值。“《中华好诗词》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它对人们情感的影响。诗词有特殊功能，能够勾起人们的情感和给人们带来愉悦。电视剧什么的我都很少看，我就爱看这个。”同时，黄大爷对图书的价格也颇为满意，“以为100多块一本，结果现在一看只要20块钱，我买了6本。”

赵忠祥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栏目从屏幕向外的一种延伸。他说，“这是近年来很流行的一种组编做法，就是演讲、写书、营销，然后影视，做一个立体化的传播，在营销的过程中推广，在推广的过程中营销，使得它达到一种‘风助火势，火助风威’的双赢效果。这也只是我们的一个尝试，不见得就是最成功的模式，但一定是非常具有前景的模式。”《中华好诗词》栏目主创认为，《中华好诗词》图书的问世不仅仅是节目的需要，也是电视产业化竞争时代做大品牌、做好产品产业开发的有益尝试。



曲艺唱响民众心声

小黄

好中国广播艺术团专场、“江南曲美”江苏专场、“蜀风蜀韵”四川曲艺专场、“晋情快乐”山西曲艺专场等共10场，上百个特色鲜明、制作精湛的节目将亮相舞台。其中，既有讴歌时代楷模和民族精神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梅兰芳·誓须明志》，也有描写小人物生活状态的《出租车司机》《麻将人生》；既有强烈地域色彩的《外婆桥》《夸宝丰》，又有歌颂祖国的《鼓舞中华》《光辉历程》。“我们力求用多样的题材、丰富的曲种，为百姓说唱，为大家带来欢乐。”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董耀鹏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演活动创造了中国曲艺家协会近年来组织的主体性活动中参演剧团最多、参演人数最多、参演场次最多的纪录。“中国曲艺家协会曾在2009年、2011年开展了以‘向祖国报告’‘向党报告’为主题的曲艺展演周，这次‘向人民报告’展演是上述主题活动的延伸和深入。”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说，“从事曲艺工作的人是一群非常可爱的人，他们把与老百姓面对面的演出当成最大的舞台，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我们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党、向祖国、向人民献上自己的礼赞。”

草根挑战文化名人

文依

如果上海的高中生、湖南的仓库管理员、四川的播音主持人、江西的台球裁判，甚至还有牙医、警察、公务员等普通人，和蒙曼、纪连海、阿忆、康震、郦波这些文化名人在电视上单挑，比赛答题，谁将获胜？通过江西卫视今年暑期以传播国学为宗旨的文化竞赛答题类节目《挑战文化名人》的12次尝试，结果是文化名人取得8胜4败的成绩。这个结果是否出人意料呢？

日前，该节目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嘉奖，认为其“内容丰富，答题过程激烈，既展示了文化名人和选手深厚的文学艺术功底，也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传授基础知识，传播传统文化，让观众重温深藏心底的文化记忆。”

这档节目中的题目与我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每期问题百余个，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知识涉及历史传说、神话典故、文学名著、诗词歌赋、历史人物与事件等。在选手遇到难题时，文化名人会在答题结束之后，为选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解。当选手答对题目时，文化名人也会进一步考察选手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节目中也有不少趣闻，如：“床前明月光”是李白的千古名句，其中“床”指的不是李白的睡床，不是放宝物的书案，而是井台上的围栏；历史上的武松与武植（武大郎）的年龄竟然大约相差250岁；“孟母三迁”的典故，孟子的妈妈最后把家搬到了哪里？正确答案竟然是校区。《挑战文化名人》还搭建了传统文化爱好者与专家学者互动交流的平台。纪连海在节目中“独孤求败”，最后一期如愿以偿，败给了自己的学生。纪连海坦言：“愿做垫脚石，推广国学，为后代奠基搭桥。”

上亿投入、海外引进版权，这曾是各大卫视趋之若鹜的综艺模式。江西卫视独辟蹊径，以一档制作经费比较低廉的原创新非明星类文化竞赛节目，探得了专家们的文化实质，也警醒民众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下滑的现状。据介绍，节目组曾向国内近百名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发出邀请，“最终能登上擂台的文化名人，确实是抱着一颗普及国学的拳拳赤子之心。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儿，被草根逆袭，不是好受的事，但他们都表现出大家风范，与草根共勉。”蒙曼自言“我爷爷就是中医，中医题没答出来，真丢脸！”但她表示，一辈子都会记住“胃之关”是肾。

文化名人康震(下)和他的挑战者江西景德镇大学生江颖婧(上)



9月3日上午，尽管北京笼罩在秋风秋雨中，但在北京国际图书节主会场中华世纪坛南广场，河北电视台《中华好诗词》栏目及其新书的“粉丝”们的热情并没有减退。《中华好诗词》栏目“大学士”、著名主持人赵忠祥和明星嘉宾左岩等来到现场，为购书观众签名。

《中华好诗词》是一档由河北电视台自主研发的文化类大型季播节目。节目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为宗旨，集娱乐性和知识性于一体，运用闯关、益智、综艺等电视包装手法，通过寓教于乐的轻松形式，打造出一档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优质节目。此次《中华好诗词》“出走”荧屏，变身同名纸质图书“亮相”北京国际图书节，依然引来不少粉丝的关注。现场人头攒动，从小孩到老人，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期待着图书签售时刻的到来。在签售会开始时，主办方还特意准备了一出“火热”的舞蹈，让现场的观众“热身”。

《中华好诗词》“大学士”赵忠祥说：“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我们今天用软实力昭告全世界，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意的国度，诗意的民族，用诗意来美化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民族。”赵忠祥还打趣道，“别的节目基本上都是新星、笑星，我们不以星为主，而是以我们的祖师爷为主，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蹦跳明星’，尽管隔着一千多年的岁月时空，但他们仍然有巨大的感召力。”

图书签名过程中，长长的队伍井然有序，大家在耐心等待的同时也拿出手机拍照，表达自己对《中华好诗词》这本新书的喜爱。数百人的队伍并没有让大家签书的赵忠祥和左岩觉得辛苦，赵忠祥说，“我很高兴为乐意让我签字的观众签名”。

翼三人分别导演的北京曲剧《四世同堂》等，田沁鑫导演也在2010年将该作品搬上了话剧舞台。田沁鑫导演说，把3卷本的《四世同堂》改编成话剧确实不易，“就像是在人家丰收的果园里摘果子，必须懂取舍、重挑选，才能把最好的呈现出来。”

这部话剧于2010年10月底在台湾中山纪念馆首演，4年以来演至台北、北京、香港、澳门等38座城市，演出总票房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今年年初，北京市曲剧团在北京、保定、重庆巡演了第三次复排的该剧，京腔京韵传递京味，也很受欢迎。

不过，相对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的《我这一辈子》《方珍珠》《龙须沟》等其他老舍作品，《四世同堂》的多元传承并不是那么顺利。“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的文学评价尺度和欣赏尺度，使得《四世同堂》在出版和传承上受到影响。”舒乙称，周扬曾要求老舍先生修改这部作品内容，以便适时出版，但老舍只对个别字词和标点进行了简单修改，所以《四世同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大范围传播，直到改革开放后，文艺指导思想改变，尤其是1985年《四世同堂》同名电视剧的首登荧屏，很多人才惊讶地发现《四世同堂》的存在。此后，观众们才得以看到《四世同堂》多种形式的上演。

“很多观众对该剧有着特殊的情感，在首都剧场的展演已是第12度在京演出，现场仍然座无虚席。”田沁鑫说，《四世同堂》写于抗战时期，但其经典性、深厚性以及巧妙的改编使得该剧常演常新，“虽是旧时的故事，但是幽默又不失现代的语言风格，消除了跟现代观众的时代‘时差’，又让传统的根脉随着剧情的起承转合深入人心。”田沁鑫说。

影视戏曲共融中不忘当代意义

“在话剧的改编过程中，我时常思考如何让观众们重新呼吸当年北平的空气，如何通过观看表演了解民族的痛楚和民族的文化之根。”田沁鑫说，“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写尽京味百态，“我们在改编时既要兼顾原著的文学性和话剧、曲艺等的特有表现形式，又要尽力融入新技术手段，在封闭式的舞台上呈现出当代的意义，让观众看到一台既熟悉、又新鲜的大戏。”她表示，《四世同堂》是一部从头到尾描写抗战的巨著，深度解读了北平77年前的荣辱沉浮，在当代的改编中“也不忘探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行为因素，挖掘国人思维模式背后的文化立场，引导观众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

舒乙也告诉笔者，《四世同堂》的舞台形式很丰富，其当代意义“不言而喻”。作品中大量的细节均控诉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罪行，甚至在当时就被日本进步人士评为“日本反战的人生教科书”。小羊圈胡同是当时中国的缩影。“老舍先生在作品中表现了民族觉醒的全过程，并从文化角度分析人物，较早显示出文化决定一个民族前进或落后的关键作用。在当代再次品读或者观看这些舞台艺术形式，我们能深刻体会到先进文化才是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可轻视的因子。”



今夏，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排演的话剧《四世同堂》在北京首都剧场展演。“当大幕徐徐拉开，旧时老北京胡同的场景突如其来。昏暗的背景前，说书人慢慢走到舞台中央，一束灯光追随，原来是演员寇振海，他用极富魅力的嗓音、表情、语言，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戏就从这儿开始。”一位网友在新浪微博中分享着自己的观剧感受。很多观众也纷纷表示，这部作品让大家在缅怀历史小说作者老舍先生的同时，通过舞台艺术再度感触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民族记忆。

老舍先生于1944年1月10日在当时的《扫荡报》上开始连载《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单行本1946年1月由上海良友公司初版，用的是《四世同堂》的名字。至今这部书已经诞生整整70年了。70年来，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曾被改编成电视剧、话剧、曲剧，以多种方式数度热播、热演，吸引着人们观看与思考。老一辈京韵大鼓名家路玉笙演唱的1985年电视剧版《四世同堂》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也一度风靡整个社会。

呕心沥血，著不朽佳作

小说《四世同堂》曾被文学界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老舍也自评其为“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最好最满意的作品”，但“这部书破百万字，著作过程相当不易”。老舍之子、前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告诉笔者，“小说的主旨、人物、故事等是由老舍想象创作的，但作品丰富、真实的细节很多是由老舍夫人胡絮青‘间接’提供的。”1943年秋，胡絮青无奈逃离北平，结束了沦陷区6年的艰难生活，到重庆郊区北碚与老舍团聚。在重庆的北方亲友不时前来看望、询问，“母亲时常根据亲身经历向亲友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犯下的罪行。”舒乙说，当时他们住的是狭小的“斗室”，所以老舍也“不可避免”地听着胡絮青对朋友的诉说。1944年，老舍为专心写作《四世同堂》，还特地发布公告称自己不再接受其它约稿，“并计划写一百章，每章一万字。当时的长篇小说其实并不长，《骆驼祥子》也就15万字左右，因此《四世同堂》在当时颇有突破性。”

“父亲对作品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详细的准备。”舒乙说，当时9岁的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把故事的发生地小羊圈胡同清晰地画成地图，“每号院、每个屋子的住户都有明确的安排，还列出一份详细的人物表，每一户的具体人员和彼此间的关系都非常详尽。”有了工具性备忘录后，《四世同堂》的创作便开始了。但当时45岁的老舍身体状况欠佳，“多病、贫血、头晕等症困扰着他，再加上当时家庭负担重，物价不断飙升，以及皖南事变后进步人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老舍先生的写作并不容易。”另外，当时的四川只有本地的土纸，老舍只能用毛笔写作，但他挣扎着坚持每天写，“第一年写出34万字，第二年33万字。”舒乙说，“因为不急于赶速度，老舍先生字斟句酌，终于用自己的心血打造出优秀、宏大的抗日纪念品。”

国家话剧院2011年版《四世同堂》的导演田沁鑫说，很多剧作家和制片人之所以将目光放到这部著作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本身的艺术性与不朽性，“文本内容的多样、人物内涵的丰富、主旨思想的深刻，都吸引着不同领域人士的关注”。

多元传承，常演不衰

曾有学者统计，根据老舍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共有17部（电视剧9部），这其中，《四世同堂》的舞台呈现方式，既有1985年林汝为导演的28集同名电视剧，也有2007年王俊导演的36集电视剧，还有鲍野明、张绍荣和王

《四世同堂》问世七十载 影视戏曲共融 演绎国恨家仇

演绎国恨家仇